

美国“中产阶级”及其经济地位的初步分析

刘峻

美国的“中产阶级”在美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是很重要的,他们人数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影响大,可以说,他们的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对于美国未来的经济发展趋势有着一定的影响。研究美国“中产阶级”现状将有助于我们分析出现在当今美国的一些新现象和问题。

一、美国“中产阶级”的内涵

要了解美国“中产阶级”的现状,我们必须要知道“中产阶级”的定义及它的划分标准是什么。

谈到“中产阶级”,很多人会很自然地他们将他们与较为稳定的工作、舒适宽敞的住宅、不错的收入等联系起来。应当说,这种联想有一定根据但并不全对,如果我们从经济学角度去分析,可以看出那只是表象而已。

当我们分析什么是“中产阶级”时,也会自然地联想到马克思的阶级学说中关于“中间阶级”的论述。“中产阶级”和“中间阶级”在英语中均为“MIDDLE CLASS”,那么这两种提法是否仅是翻译的不同还是指的是两个不同的社会层次呢?让我们来看看马克思对于“中间阶层”的论述和西方资产阶级学者们的观点。

马克思认为,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中除了两大对立的阶级,还有其他多种多样的中间集团,他们并不属于以上任何一个阶级,在生产资料方面也没有任何共同关系。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说,这就必须将之划为“中间阶级”(国内也有人称之为“中间阶层”)。而这部分“中间阶级”随着生产方式的不断演变而必然带来一种分化,就是“中等等级的下层,即小工业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和农民——所有这些阶级都降落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了,……”。

这部分“中间阶级”的特征是:他们既不是雇佣工资劳动者的资本家;又不是受资本家雇佣的工人,他们是靠自己的独立劳动为生的。作为独立劳动者,他们接近于工人阶级;作为流动资金的所有者则接近于资产阶级。成功会使他们有更多的资金,使他们列入下层的资本家阶级;失败就会夺去他们的资金,将他们抛入工人阶级的行列。

从资本主义制度建立至今,西方学者们对“MIDDLE CLASS”的解释是多种多样的,其原因主要是试图回避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现有的称谓“中产阶级”也是经过了一些变化的。随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和资本主义进入垄断帝国主义阶段后,西方对于“中产阶级”的理论更多地沿用了所谓“瓦纳社会阶层”中的划分标准。1941年,瓦纳和兰特这两位社会学家在他们的著作中,把社会阶层分成6个,即:上等社会的上层和下层,中等社会的上层和下层,下等社会的上层和下层。而“中产阶级”则是由上等社会的下层和中等社会的上层、下层以及下等社会的上层所组成,即是下文所讲到的第1、2、3、4和5阶层中的第2、3、4阶层(其中,第1和第5阶层分别指的是贫困阶层和富有阶层)。

经过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在理论上“中间阶级”与“中产阶级”并不完全相同,马克思所讲的“中间阶级”是从生产资料占有关系的意义上来加以确定的内涵,而“中产阶级”则是更多地以职业、收入和地位等因素为划分标准的。实际它回避了生产资料占有关系这个根本性的问题,将更多的小业主、农场主等小资产阶级和大量的无产阶级中的“高收入者”通通塞入这个范畴之中,形成一个扩大的外延。

但是,由于这里考察的是美国社会中的经济现象,因而我们也要从“中产阶级”的划分标准之一收入这个角度,来动态地理解这个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阶层,为了方便描述和分析它,下面我们仍然沿用了现在人们更为常见的“中产阶级”这个术语。

在西方诸国中,尤其在美国,“中产阶级”的划分标准是根据家世、收入、学历、职业、住宅和居地所在来综合考

虑的,其中“收入”是主要的判别因素。它的变动范围是很大的,也是因时因地而不同。例如,里奇曼·路易斯在他著的《为何“中产阶级”有焦虑之感》一书中,认为年收入在18 000美元至75 000美元(1988年美元标准)之间范围的就可以算是“中产阶级”了,并且认为这部分人数占美国人口的2/3。美国的经济学家罗勃特·劳伦斯则将这个范围划定为13 000美元至25 000美元之间。美国人口调查局则认为应该是从15 000美元至35 000美元才能被划入“中产阶级”,并且它还细分为“小中产阶级”和“大中产阶级”,前者的收入标准是从15 000美元至24 999美元,后者则是从25 000美元至34 999美元。

同时,收入在地区与地区之间也有很大的差异,例如,1个年收入在40 000美元水平的家庭,在纽约市曼哈顿区居住,可能是中下水平(曼哈顿有20%的家庭的年平均收入为174 000多美元),而在美国其他地区则绝对属于生活富裕的中中或中上水平。这种收入在尺度划分上的不确定性,造成了“中产阶级”内部成员的确定上的不同。但是如果我们以美国中等收入线的标准来看,大体还是可以判定,在收入上从20 000美元至50 000美元之间的应为“中产阶级”。以1993~1994年为例,此间的居民年平均收入为32 264美元,如果我们上下各浮动1 000美元左右,是可以据此判别的。

二、“中产阶级”面临的处境

尽管美国人口调查局在一份报告中也坦率地承认,时至今日对“中产阶级”仍然没有一个正式的定义说明,但这并不妨碍它试图去运用两种对收入分配的统计指标来分析这个阶层的现状:一个指标是“居民总收入的分配”,另一个指标是“吉里系数”。

根据这两个指标,我们比较社会各个阶层在1992年和1993年的总收入分配比例关系,就可以判断出居民的收入分配的不均衡状况是不断上升的。按照美国人口调查局对于1992年和1993年总收入在社会各个阶层分配的计算,认为在社会第1、2、3阶层中收入比例是不断下降的,与此相反,第5个阶层也就是上层阶级占总收入分配比例是不断上升,第4个阶层则无明显的变动。数据表明,在1992年,社会第1、2、3阶层所占总收入的比例依次为3.8%、9.4%、15.8%,对应于1993年,这3个数字为3.6%、9.1%、15.3%。而在1992年,第四个阶层所占的比例为24.2%,对应于1993年为23.8%。第5个阶层正相反,在1992年为46.9%,但在1993年却上升到48.2%。同一时期,吉里系数也指明总收入在分配上的不平等正在加剧,在1992年,吉里系数为0.434,明显低于1993年的0.447的水平。

根据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认为,“中产阶级”在总收入分配中所占比例是不断下降的,揭示出他们在人数上有所增加,使得名义工资收入较往年有所提高,但加上通货膨胀因素后,他们的实际生活水平是下降了,而贫困阶层和工人阶层的处境更不如以前。

下面再来看看“中产阶级”中白人和黑人在总收入分配中的状况(见表1、表2)。

表1 白人居民中社会各个阶层和5%最高层所占有的总收入分配的收益

年份	人数(千人)	总收入分配比例(%)						中等收入水平(美元)	吉里系数
		1	2	3	4	5	5%		
1993	82 387	3.9	9.3	15.3	23.3	48.2	20.7	43 285	0.444
1992	82 083	4.1	9.7	16.0	24.1	46.2	18.3	42 001	0.423
1967	54 188	4.1	11.2	17.4	24.0	43.3	17.3	33 776	0.391

资料来源:1994年美国人口调查局出版的电子刊物CD-ROM《收入和贫困》。

表2 黑人居民中社会各个阶层和5%最高层所占有的总收入分配的收益

年份	人数(千人)	总收入分配比例(%)						中等收入水平(美元)	吉里系数
		1	2	3	4	5	5%		
1993	11 281	3.0	7.7	14.3	23.7	51.3	21.1	27 229	0.484
1992	11 190	3.1	7.8	14.7	24.8	49.7	19.2	26 170	0.471
1967	5 728	3.8	9.3	15.9	24.3	46.7	18.2	21 484	0.432

资料来源:1994年美国人口调查局出版的电子刊物CD-ROM《收入和贫困》。

很显然,不仅仅是从社会总体水平我们可以得出以上的结论,从社会各个阶层、各个种族间的比例关系也可以看出,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均衡仍在加剧。而且家庭构成的不同也使得“中产阶级”在收入中具有差异性。先假设一个家庭在家庭关系上有以下几种情况:或是已婚,或是未婚。如果是已婚,又可以分为已婚两人家庭、男性户主家庭(妻子已离开)、女性户主家庭(丈夫已离开);如果是未婚家庭,则只有男性居民和女性居民两种类型。

表3 各种家庭类型的收入平均数

家庭类型	1994年		1993年		1993~1994实际 收入变动比例
	人口(千人)	收入(美元)	人口(千人)	收入(美元)	
已婚家庭:					
俩人已婚	53 858	45 041	53 171	44 233	1.8%
男性户主	3 226	30 472	2 913	30 613	- 0.5%
女性户主	12 220	19 872	12 406	19 020	4.5%
未婚家庭:					
男性居民	13 190	24 593	12 462	25 361	- 3.0%
女性居民	16 496	14 948	16 155	15 264	- 2.1%

资料来源:1994年美国人口调查局出版的电子刊物CD-ROM《收入和贫困》。

据上表的数据,我们可以分析出,“中产阶级”的收入状况不断下降。特别是妇女在收入上遭受歧视,她们的收入不如男性居民,这种下降更令人担忧。其实,不光从以上两个方面,在其他的方面,如“中产阶级”成员所受教育程度、年龄构成差别和地域的分布上,我们都能看出这种现实的不平等。一方面,“中产阶级”在整个社会里与上层相比在不断地下滑;另一方面,在其内部构成中,其成员也呈现出不平衡性。一般地讲,白人居民在收入上超过黑人居民或其他少数民族居民,女性的工薪低于男性,单身不如已婚者,年龄在30~50岁之间的平均年收入超过其他两个年龄层次的居民。同时,一个人收入的高低也与他在美国所处的地理位置是相关联的。由于在历史上美国的东北部地区经济增长快于中西部地区,因而东北部地区的年平均收入高过美国的中西部地区。在教育程度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个人所获得的收入与他所受教育程度是成正比例关系的。在美国,教育不仅是使个人上进、使杰出者脱颖而出的机会,而且它也是一种投资,投资越多的人所得到的报酬也越大,我们可以从下面的材料中的数据得以证明:

表4 教育与收入的关系

受教育的时间	1987年平均收入(美元)
16年以上	33 500
13至15年	24 600
12年	21 100
9至11年	14 000
8年	11 300
7年以下	9 400

资料来源:1994年美国人口调查局出版的电子刊物DC-ROM《收入和贫困》。

它充分地说明,教育不仅可使一个人在职时有增加的收入,同时也影响其前途和社会态度、政治观念。而且愈来愈有证据表明,一个人所获的教育水平高低,不仅投资回报于自身,而且对于下一代的社会地位也有着重要影响。我们很难设想,一个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普通家庭,他们的子女有理由可以获得比其父辈们更好、更多的教育机会。

以上这些方面不仅拉开了“中产阶级”与上层阶级社会的差距,同时也拉大了“中产阶级”内部居民之间的差距。

“中产阶级”虽曾在历史上的各个时期都表示过不满,但仍没有今日的美国“中产阶级”的不满情绪严重。他们不满于这样一个事实:整个社会财富正集中于少数人的手中,而“中产阶级”内部的不均衡状态更加剧了这种不满情绪的扩张,进而对于整个美国社会表示担心和失望。

正如罗切里·李·斯坦福于1994年12月在《美国国内期刊》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所分析的,现时在美国社会中出现了一个“焦虑的阶层”,这个阶层中包括了“中产阶级”的绝大多数。而根据美国劳工部部长罗伯特·B·里奇先生的看法,这个“焦虑的阶层”中的人们正处于危险的经济压力的中心。他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发表了这样一段谈话,“其中的大多数拥有工作,但在维持他们的地位水平时又感觉到不容易,并且对于他们的子女的未来感到担忧。”

的确,目前困惑着“中产阶级”的也就是这些担忧和焦虑。他们通过自身在这15年的生活水平的判断而对美国经济泄了气,进而他们对于未来也失去了信心,于是就怨声载道,他们人数多、影响大,这就成了1994年美国国会选举中民主党失败,共和党大获全胜的原因之一,“中产阶级”把当权的民主党当作出气筒,共和党人也顺应时势,向他们许诺给予他们想要的。

那么,“中产阶级”想要的是什么呢?斯坦福在文章中归纳了这么几点:减少税收、社会福利开支和其他社会项目并且减少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中产阶级”对于美国经济和社会的不满主要也是针对以上几方面的。

三、影响“中产阶级”处境的因素

乔治亚州的共和党人奈伍德·金里奇在1994年选举日前的记者招待会上,一语道出了这些“焦虑的阶层”的大多数选民的心理感受,“美国”中产阶级“需要……一个工作的机会,一个能将他们所挣到的收入储蓄起来的机会,他们自己能自由支配(这些收入)的权力,……”。我们也可以大致确定有以下几个主要因素是他们面临的威胁和焦虑的根源所在。

第一个因素:社会生产力状况

我们需要看到,为什么发生在“中产阶级”身上的这些忧虑和威胁没有发生在40年代呢?实际上这与美国的宏观经济环境是分不开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经济经历了长达20~30年的高速增长时期,按1972年不变价格计算,从1947年到1979年,国民生产总值从4680亿美元增加到14316亿美元,平均年增长率为3.6%,工业生产增长了2.9倍,平均年增长率达到4.3%,这是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黄金时期”。

在这一时期,美国的社会政治环境相对稳定,生产力水平得以空前的提高,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人们的实际购买力水平较强。重要的是,人们的信心得以恢复,对未来充满憧憬,在这期间,也是美国“中产阶级”日子最为好过的时候,无论是人数的扩充上还是实际生活水平都明显有了提高;但进入80年代后,社会生产力的增长速度开始逐年下降,保持在一个较低的缓慢发展水平上。伴随着这种经济的低速增长而来的是政府开支的急剧增加。在1990年,美国联邦政府预算支出构成中,国防开支为3030亿美元,社会保障和医疗的开支为3416亿美元,它们共占当年预算总支出11518亿美元的55.96%,对应于1994年,这四者的数字分别为3543亿美元、4465亿美元、13116亿美元和61.06%。这样一来,可被分配的收入大为减少,再加上通货膨胀的因素,使得“中产阶级”的日子更不好过了。

第二个因素:商业中的消费信贷手段

按照前面所分析的美国“中产阶级”的划分标准,其主要成员是靠劳动收入而不是财产收益为生的。无可否认,表面上“中产阶级”甚至是许多穷困人家,他们在生活消费水平上有一定的提高,如1977年,消费者用于汽车上的开支要占他们预算的13.4%,到了1983年,美国共有23453万人口,注册小汽车为13010万辆,平均不到两人即拥有一辆小汽车;1940年美国人自有住房只占44%,到1970年上升为63%,1983年美国8391万户人家,住房却达到9352万所。

但是我们不能忘记美国是一个债务经济的国家,美国公民只要有一份工作就可以借钱购买住房、汽车以及其他的家庭耐用消费品。例如在1984年,美国消费信贷总额为5771亿美元,占个人可支配收入的22%,其中分期付款信贷总额为4605亿美元,而用于购买汽车的分期付款额就占到37.5%,用于购买住房的分期付款额占5.3%。

美国人因而不必筹集足够的钱即可买到房屋、小汽车和其他耐用消费品,余款在剩余的几十年内还清,但假若失去工作,保证不了到期的还款,则银行将上门来收回所购买的物品,甚至于将付不起购屋余款的不幸者“扫地出门”。许多美国“中产阶级”所拥有的财富,实际上是对未来生产的预支,靠日后的劳动来偿还,而他们所恐惧的也正是失业问题的困扰。

第三个因素:失业的阴影

如前面提到的,失业是始终笼罩在“中产阶级”头上的阴影,如果失业,不但财产会受到损失,连个人的生活都会发生困难。虽然在目前,并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因为失业而落入贫困阶层的确切“中产阶级”的人数,

但这并不是说他们就摆脱了这个压力和阴影。

经过里根政府和布什政府数年的努力,失业率自1985年来不断下降,1985年失业率为7.2%,1986年至1988年依次为7.0%、6.2%和5.5%,但必须指出的是,女性的失业率是高于男性的,如1988年,女性的失业率为5.6%,男性的失业率为5.5%;同时,非白人种族的失业率为白人的两倍以上,我们仍以1988年为例,非白人的失业率为11.7%,远远超过白人种族失业率的4.7%的水平。

“中产阶级”的状况如今大大不如往前,长期以来他们被视为是职业较为稳定,在一般情况下失业也轮不到他们,除非遇上经济的周期性衰退。但是近来,即使在经济比较繁荣的条件下他们也遭到大量的解雇,这是因为科技进步后,“中产阶级”雇员原有的熟练技术知识落伍退后,加上出现“机器排斥工人的同时也排斥了‘中产阶级’的位置”的现象,使得他们的工作岗位可以撤销。这些人特别是中高级管理人员在失业后虽仍有可能再重新得到新的工作,但收入肯定不如以前。例如,一般情况下,这种管理人员每小时工资是15~20美元,但在新的岗位,很有可能只有每小时10美元的水平。

在“中产阶级”面临的失业压力中,大致有两种因素单独地或联合地在起作用:其一是美国产业政策的变动而带来的结构性问题;美国在80年代进行的产业结构调整具有重要的意义,最为重要的是新兴的高技术对于产业结构的影响,表现为传统工业普遍得到了改造和设备更新,电脑被普遍采用;新兴行业(如信息业、生物工程等)因政府的科技政策鼓励而获长足进步。同时,在整个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上,还出现了新的变动趋势,即按就业人数和在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第一、二产业继续下降,第三产业进一步快速上升。这样,由于产业结构的变动而带来的失业问题就必然出现不利于“中产阶级”的方面。

美国的詹姆斯在他所著的一部书《“中产阶级”在后工业社会中的下降状况》中分析道,根据他从加利福尼亚城市如旧金山、奥克兰等市收集来的数据,显示了正在发展中的服务业中贫富差距状况大于传统的制造业中的情况。在服务行业的从业人员增加的同时,他们所获的收入多半属于两种对立状况,要么收入高,要么就收入低。鲍尔·里斯卡维奇在1994年也指出了这一趋势,他说,“收入很好的工作和另外一些年收入在14000美元和28000美元水平之间的虽不属于低工资,但低于中等水平的工作都得以明显的增加。”但是特别对于男性就业者,“……在年收入为24000和48000美元的中等水平的工作却是更少了。……”

这样一来,明显地由于产业结构的调整而出现的结构性失业就严重地威胁了那些处于“中产阶级”的中下等水平的成员,但不幸的是,他们又是人数最多的。

其二是由于经济周期的波动性而带来的总量失业问题。由于有关经济周期的波动对于失业的影响的论著很多,我们这里就不一一详述。这种总量的失业在某种程度上并未给“中产阶级”带来多大的不安,只要经济稳定,没有出现较大的衰退和经济的不景气状况,他们并不会比其他阶层的人们受到更多的失业的威胁。但是由于近期出现的经济不景气,规模大而且涉及面较广,这就不可避免地给“中产阶级”的大多数蒙上一层阴影。

我们从以上三个方面分别论述了目前威胁着“中产阶级”的各个因素状况,可以说,这几方面并不是完全包括了“中产阶级”对未来担忧的根源,它们只是问题的主要方面,并且这几个因素对于“中产阶级”内部不同状况、地位、环境的成员的作用也是不尽相同的,甚至同一环境下的“中产阶级”成员对于这几方面的担忧程度也不相同,毕竟他们所面临的威胁和压力,许多是来源于心理上对于未来的担心,这种担心因个人心理素质的不同也是有所侧重的。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在这几个因素之中,它们不仅单独或联合地起作用,而且它们之间往往也有着复杂的、互为因果联系的关系,这种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又加大了解决“中产阶级”所面临困境的难度。

注释: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6页。

[美]布·罗贝:《美国人民:从人口学角度看美国社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237页。

吉里系数,又叫“收入集中指数”。它的变动范围是从0到1,当系数为0,是“收入的绝对均衡”即每个人均获相同的收益;为1时,是“绝对的不均衡”即所有的收入都仅被一个人获得。

1994年美国人口调查局出版的电子刊物,CD-ROM《收入和贫困》。

离开(NO PRESENT):指的是有可能离家出走,也有可能是已经过世或是离婚、分居等情况。

梅孜编译:《美国政治统计手册》,时事出版社1992年版,第215~216、224页。

陈宝森:《美国经济与政府政策》,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633页。

储玉坤、孙宪钧:《美国经济》,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86~187页。

(责任编辑 徐云鹏)